

5685 122

92
E264.3
2

目 录

忠魂不灭 浩气永存(代序)	黄渐鸿 (1)
镜泊湖连环战役的回忆	李延禄 (3)
艰险的途程	冯仲云 (52)
点燃抗日火把	王保益 (106)
旗掩火龙沟	张 森 (118)
木炮显神威	沈 征 (121)
小蓝子卖梨	刘文葛 (125)
蒙古山战斗	钜景芳 (130)
家	祝守贵 (135)
血肉相连	张志根 (138)
牡丹江畔英雄女	母书纲 (142)
忆何春淑同志	范德林 (149)
夺马记	王明贵 (155)
回忆杨靖宇将军	李久玉 (159)
一碗面糊	周万金 (162)
魏拯民的故事	征 办 (166)
李兆麟将军二三事	郭肇庆 (171)
三肇烽火	钜景芳 (178)
挂标语	黄宴阁 (195)
黎明前的战斗	王英泽 (199)
送信	王 钧 (209)
除暴安良	李 子 (213)
草率未归	古 矢 (226)



B 825487

夜袭	张 祥 (233)
山里行军	晨 溪 (238)
西进	沐 南 (250)
光耀关东不灭的星	荆南进 (264)
编后记	编 者 (274)

忠魂不灭 浩气永存

(代 序)

黄 渐 鸿

今年9月18日，是著名的“九·一八”事变60周年。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编辑出版记载东北抗日联军战斗历程的《关东浩气》一书，纪念先烈，弘扬传统，学习精神，激励后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我们党首先举起团结抗日的旗帜，伸张民族大义，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民抗战。我们党和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在八年抗战中起了中流砥柱作用，中国人民终于第一次取得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东北抗日联军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由东北各民族人民参加的抗日武装。60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影响下，东北军放弃抵抗退入关内，东三省很快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3000万东北同胞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在此危难时刻，中共中央及中共满洲省委，立即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不抵抗”政策的投降主义实质，号召人民奋起抗战，迅速派出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东北各地，组织和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抗日武装。东北抗日联军就是在这样背景下诞生的。她是一支在党领导下，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他们长期孤军敌后，转战于白山黑水和丛山密林，历尽千辛万苦，战胜了无数难以想象的苦难，坚持敌后游击战争14年，歼灭和牵制了大量日

伪军，用鲜血和生命创造了灿烂的业绩，为东北和全国的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将永远为后人所尊敬、怀念和学习。

在“九·一八”事变60周年之际，出版这样一本缅怀先烈光辉业绩、反映英雄们战斗历程的书籍，尤其使人感到振奋。邓小平同志曾经谆谆告诫全党同志：“永远铭记着在过去长期艰难的岁月里，人民英雄们用自己的鲜血才换得了今天的胜利。”牢记过去，才能珍惜今天。作为东北战区的指战员，更应该十分清楚地了解这段光辉历史，学习先烈们无私奉献的精神，继承发扬革命传统，紧紧握牢手中枪，守卫好祖国的北大门。当前，世界上旧的格局被打破，新的格局尚未形成，正是处于大变动之中，军队面临着改革开放、和平环境及“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等新的考验，肩负着巩固国防，抵抗侵略，捍卫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制度，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和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的历史使命，任重而道远。因此，我们必须加强革命传统教育，把部队的思想建设搞好，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实保证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

前事不忘，后师之事。我相信广大干部战士，能够从《关东浩气》一书中，汲取精神力量，以革命前辈为榜样，激励自己，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而奋斗。

1991年8月于沈阳

镜泊湖连环战役的回忆

李延禄

1931年“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侵占我东北三省，事变之时，国民党蒋介石卖国政府宣布了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却派了大批的杰出干部出关，著名的刘少奇、罗登贤、陈潭秋等同志，都曾经先后来到东北，领导满洲省委，组织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

在当时，我们东北的共产党人，确如星星之火，在满洲省委领导下，1932年终于形成为期很久的燎原之势，哪里有抗日游击战，那里就有我们杰出的共产党员的领导。在吉林磐石县，出现了以后由杨靖宇同志直接领导的李红光游击队，在吉林宁安出现了党秘密领导的抗日救国军第一补充团，当时我以救国军参谋长的身份，兼任补充团的团长。著名的镜泊湖连环战役，四截田野“万人大军”，终于把它歼灭，就是在地下党的领导之下，所取得的辉煌战绩之一。不仅军事上我们取得彻底的胜利，主要的还在于它的政治影响很大。由于1932年3月，我们的镜泊湖大捷，才奠定了那些为国民党不抵抗主义所瓦解的、救国军各派系的广大官兵的抗日必胜的信心，巩固了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抗日统一战线。

—

1931年“九·一八”日寇侵占我东北不久，有日本“敦图线”铁路测量队人员，企图闯入驻延吉的东北军原第十三混成旅

第七团三营的防地明月沟，不听警告，为值日哨兵班长周某下令，开枪射击，击毙七八人，余者鼠窜而逃。日伪当局得讯，反而将三营调往吉林驻防，声言提升三营营长王德林为团长。三营奉命移防，由敦化上火车之后，全体下级官兵闻知将去吉林，顿然变色，忿不受命，王德林在全营官兵抗日要求和拥戴之下，遂拒绝西上，把队伍拉到汪清县境的小城子兵营去，酝酿抗日。

9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组织群众抗日的号召，中共满洲省委接到密电指示后，中共延边四县地下中心县委于28日召开紧急会议，由县委书记小李同志，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的指示，作出六项发动东北抗日斗争的决议，并决定派我到王德林部队中去开展党的工作，巩固其部队抗日到底的信心和决心，在游击战中，开展党的革命武装。因为我和王德林之间，友谊深厚，这种亲切的关系，还是远在民国初年开始的，由于一种特殊的机缘，取得了他感恩式的尊重与信任。此外，中心县委会议还决定在我去之后，续派孟泾清、金大伦等4名同志，参加王德林部队，去建立党的组织，领导抗日斗争。

我带着党的使命，从延吉辗转来到汪清，找到王德林部队在小城子驻扎的营地，却不料国民党投降派盖文华、李耀清、赵冠民等3人代表团，早已捷足先来。

谁都知道，9月22日——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东北的第四天，即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抗日号召的同一天，国民党投降派的大头目蒋介石，就在南京市党部召开的会议上宣布了他那遗臭千古的“不抵抗主义”，而以盖文华为首的3人代表，就是受命来此说服王德林及其部队执行国民党“不抵抗主义”卖国政策的。他们给王德林带来了“自卫军第一路军总指挥”的头衔，企图改编王德林的部队，改变其部队的抗日性质，如蒋介石在“告全国国民书”中所说“诉之于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我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王德林在这样3个聒聒

健谈的国民党不抵抗主义集团的代表面前，纸烟是一根接着一根地抽，很沉闷，一句话也不说。

当时，国民党政权在一般东北军官中间还有一定的迷惑力，这种迷惑力正像密布人民头上的乌云一样。中国共产党像是被这乌云遮蔽的太阳，只有站在一定的地方，感受到从这乌云密布的隙间透出阳光的空间，才能预测到民族所面临的未来晴空万里的时代。王德林是一般的头脑简单的东北军军官，当然也不例外，当时完全为这块当头的乌云所迷惑。此外，在座的还有当时的抗日将领李杜的代表，这个代表带来1万元的军饷支票，要求王德林编为1个团，受李杜调遣，配合作战。两方代表之外，还有来自吉东3个县的以曹梦九为首的所谓士绅代表团，他们依恃封建结盟的友情，都口称饱读诗书，深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义，但却希望王德林不要“轻举妄动”。在他们看来，王德林如果是“识时务之俊杰”，就该“静伺机宜”，既不联李，也不依蒋，而应该编为“山林警备队”，“自固待机”，“可进可退”。实际上，是给王德林部队的未来开个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后窗。因之，王德林当时在这些来自各方的代表围攻当中，纸烟是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犹疑、沉闷、困惑，不能自解。另外，还有原东北第二十一旅旅长赵芷香，意图抗日，派来代表伊晏波。总之，这些来自各方面的代表群之间，在围攻王德林的同时，各展唇齿，相互舌战。

我一到，王德林就慨然地说：“你到底来了！”原来，我未到之前，他已经打电话到延吉各处去打听行踪了。从吉东3个县来的那些所谓士绅代表，我因为东北军的关系大半都认识，不是大地主，就是背后放高利贷的殷商富户，他们的老式穿戴都挺体面，有的雍容自得，有的故在唏嘘。在民族、国土，被日寇残害、焚掠、侵辱的时候，看见那些侃侃然谈吐自怡的国民党代表，看见这些盛装的绅士们，总使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厌恶情绪。王德林仿佛感到我神色间所现出的这种情绪，不容我开

口，就说：“庆宾，你先去休息！歇歇再说话。”

这样，我就单独走开了。直到吃午饭，我们俩人单独见面的时候，王德林才开始谈到来自三方面的代表们所怀的意图，以及军饷一毫莫筹的困窘处境。那些代表们呢！仿佛很怕我们俩有单独密谈的机会，也许很想知道我们谈话的底细，观察王德林对我的态度。总之，我们的谈话还没有深入，饭还没有吃，他们就各自离开大厅的餐桌，匆匆忙忙抢先赶来了。这样，我们不得不改变话题，转到一般的关于伪军动态之类上的问题了。

饭后，我在单独休息中间，接触了王德林周围的官佐及其亲信人物孔宪荣、吴义成等。这两个人，都是王德林绿林时代的“底柱子”。1948年，孔宪荣在出席伪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的所谓“国大代表”会议的时候，认识到自己途穷路末而悬梁自杀了。当时，他在王德林部下任第十连连长，倾向吉东3县所谓绅士代表的意图，意在投机取利，极为狡黠。吴义成和他相反，头脑简单，是王德林的悍将，以王德林的意旨为意旨，主张“既已拉出来，就不妨打打试试”。另外，还有两个连长，是汉奸熙洽介绍来的人，自然根本谈不到抗日。主要的抗日力量，在于基层。

我依据中共延边中心县委的指示，在王德林大营的“兵棚子”里，和广大基层士兵中间接触当中，先后发现了史忠恒、朴重根、李凤山等班长，都是高小毕业生，年轻力壮，满怀救国热情，积极要求抗日。在这里，证明了工农儿女们的优秀的阶级本质。

当天深夜1点，所有那些各式各样的绅士代表都离开王德林归寝之后，只有孔宪荣依恃王之亲信的身份逗留不去。自然，他是要在我们谈话中间，看看他们老营长的手里到底是张什么“底牌”。

王德林终于这样问我了：“你什么都知道了，现在你说吧！我该怎么办？”

我说：“你今年50几了呀？”

他低沉的说：“54了！”

我说：“是呀！你已经54岁的人了，难道你还能再活一个54岁吗？”

他不说什么！

我说：“在今天，你不站出来当岳武穆，难道你还要当秦桧，给子孙留一个万世的骂名吗？”

他立时忿然地说：“咱们怎么样，也不能当秦桧呀！”以后就果断地说：“咱们一定要抗日，绝不能给子孙留下骂名，可是那3个国民党代表怎么处置呀！”

我记得当时孔宪荣说：“抗日也行，可也别说的这么死，和各方面的代表，还得拉着，不能松手，看看大局再说。”

我们没有注意他的话。我建议，把国民党投降派的代表尽快打发走，既然要抗日救国，就不能留在这里扰乱军心，瓦解士气；在内部，还应该清除熙洽派来的那两名连长。王德林同意我的意见，又提到李杜代表所提出的问题。我说，只要我们对日展开游击战争，队伍是会很快扩大的，给李杜编一个团的力量是不算什么的，只要抗日，我们就支持。王德林在谈到我的时候，坚决不让到“兵棚子”去扛枪，要留我担任他的参谋长，并且兼职为李杜编制的第一补充团团长。王德林在思想上摆脱开来自国民党3人代表和地方绅士代表在政治上的围困之后，心情豁然开朗，提出队伍中缺少知识分子“不能成大事”的问题，我这时候就向他介绍了中共地下中心县委所决定的，参加其部队作建党工作的人员名单。他听说，孟泾清同志是哈尔滨工大的学生，金大伦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便认作风云中的杰出人物，约请孟泾清，刘静安两同志将来任抗日救国军之正、副参谋长；金大伦、贺剑平两同志将来任宣传部正副部长。

在这天夜里，除去我们确定打发国民党3人代表和所谓士绅代表们离开部队之外，还初步确定了第一补充团的编制基础。因为，这时候在东北军上层虽然是乌云密布，迷惑犹疑，但在广大

的东北人民之间，抗日热情极度昂扬，正处春风野火一般，杰出的矿工和汉鲜两族起义的农民，以及吉东各县中小学教员等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纷纷来投，王德林在犹疑不决的阶段，正不知怎样来安插，现在补充团就以这些工农成分出身的爱国青年为基础，以后，又调来老三营的史忠恒、朴重根、李凤山等班长为补充连连副，进行整训。党用秘密形式所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从此诞生。

总之，我们谈的很舒畅，王德林在谈话中，还喝白兰地酒助兴，我虽滴酒不沾，却也兴奋有神，直到鸡叫头遍，才感得夜深气寒，下半夜3点，才就寝。倒下之后仍然久久不能入睡，考虑怎样向地下党委汇报、请示等等问题。

第二天，我开始为王德林的部队筹募经费，以便尽快的遣送国民党3人代表出境。原在小城子，有一个电报局副局长，是个有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上海人，我曾经和他接触过，知道他拥护抗日，和他正式提出经济支援的要求时，他不但把所有敌伪电报局公款2000多元全部捐献，并且愿意率领全局爱国职工，随军队服务。他的家属，不久全都遣回上海去，而所有的通讯设备，他都带到部队中来了。他为抗日斗争作出了很多的贡献，可惜一年以后，由于留在上海的家属需要赡养，随王德林撤出国境南返了。总之，我们由于他的支持，有了一点经费，在遣散国民党3人代表时，每人发给路费100元。当王德林向国民党3人代表表示了坚决抗日的态度之后，他们竟无耻地挑拨说：“你知道，主张抗日的是共产党！”王德林说：“我不管是共产党、国民党，只要打日本人，就是好样的。”实际上，他并不知道，共产党是何样人，只要打日本，在他认为就是好样的，不过是表示对于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激愤。那3个国民党代表，终于悻悻然地离开了。

但是以延吉县实业局长曹梦九为首的所谓地方代表团，却仍依持和王德林的封建结盟的关系，不甘失败，还想无耻的留

在部队里说服王德林投降。等到部队向蛤蟆塘（又名双河镇）集结的时候，从敦化、蛟河、宁安等县又来了一些商会会长，总共有吉东8个县的所谓士绅代表都聚集在王德林周围。这时，王德林抗日救国军已有1100多人，声势浩大，有些绅士初来很感到吃惊，但以曹梦九为首的那些所谓士绅代表，却无动于衷，还在围攻王德林，大言不惭论山论水，论仁论智。王德林碍于情面，终于在蛤蟆塘把所有来自吉东8个县的绅士代表们召集到一起，说：“今天，让庆宾和诸位谈谈吧！”并当众介绍我是部队的参谋长。

我当时是个三十七八岁的青年军官，性体较傲，实在也鄙视这些所谓士绅代表，尤其是这时候，我们已经知道日伪除了派出这些代表之外，还从延吉派出来伪警备旅（原混成第十三旅）进驻双河镇作为声援。

所以我当时很气愤，我说：“我们过去都是朋友，可是，今天，我们是抗日救国的军队，你们呢，是亲日的汉奸，知道不知道？汉奸就应该绑到外头去枪毙！”

所有那些所谓士绅代表团，一改雍容自得的姿态，全都惶然失色，悚然地站起来。因为他们完全没想到，我会“变脸不认人”，没想到在头脑简单的东北军人当中，会有人看出他们藏在背后的尾巴。王德林当时安抚大家，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担保大家的安全就是啦！都坐下，坐下来！”有些大地主和背后放高利贷的殷商富户，脱下帽子来，惶惶然声辩，说：“参谋长误会了！”

我说：“你们来说服什么呀？给日本人当说客，瓦解我们抗日救国军士气，不是汉奸是什么？你们若真心不当亡国奴，你们看我们部队人这样多，财政有困难，为什么不想法给我们募捐呢？”

以敦化县商会会长万茂森为首的几个代表连声说：“我们刚来不久，真没想到咱们的抗日部队这样大，士气又这样高呀！本

来，我们不知道部队经费这样困难。回去以后，一定要办！参谋长，你放心就是啦。”

我说：“这要看事实啦！”另外，我还告诉他们，我的母亲、家属，都还留在敌占区延吉县，如果他们要告密，向日本人请功，就尽管去告密，我说：“要救国的人，就不能顾家，因为大义而全家遭害的人，哪一个朝代都有！”他们都连称“不敢”，有的说：“那还是人么？”日后，他们确也没有敢告密，但以曹梦九为首的几个汉奸士绅，却接受了日伪颁发给他们的奖章。同时，也有以万茂森为首的敦化等3个县的商会会长，履行诺言，果然秘密地为我们募了一大批捐款，并派代表来部队联系，报告敌伪在县“永衡官银钱号”还有大笔“公款”，希望我们很快去攻城，以便把这些款项提出来。从此可以看出，我们城市的工商界爱国人士，只要是树立起民族正义感，知道我们要果敢地抗日，就会反过来拥护我们的。

我们在1932年2月间，开始攻打敦化、额穆、蛟河3个县县城。而镜泊湖战役，就是由于我们连续攻克这3座县城，获胜之后，引起的战斗。

二

在这里要说清楚的是：打敦化之前，我们作建党工作的领导同志孟泾清来了。并且如我前面所说，在抗日救国军中取得了正参谋长的公开职位。我们很快的在第一补充团里建立了秘密的党支部，孟泾清同志担任支部书记。他是一个风度稳健持重的人，马列主义修养很高。当时，参加支部工作的还有史忠恒同志，另外还有朴重根、李凤山两个补充连连副，都是吸收不久的新党员。在第一次支部会议上，孟泾清同志作了关于发动抗日战争的传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这次会议上指出抗日游击战的长期性，说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工业国家，是“世界列强”之一，我们想很快的就能把他们赶出去的急躁情绪是要不得的。这

就在思想上，给我们那些新党员建立了持久的思想基础。以后，我们又缴获了汪清北部和宁安南部的地主自卫队和警察队、保安队等共约600人的武装，补充团的武器装备才有了底子。全部抗日救国军，已发展到1100人挂零的武装。

1932年2月间，以我们第一补充团和吴义成所率领的“老三营”前锋部队，为进攻敦化的两大主力，开始向敦化进军。孔宪荣为了保持自己的实力，带着一部分部队，作“后卫”。

当时，我们的部队虽说已庞大，但纪律严明，服装也还整齐，尤其是从老三营调到补充团里的战士，仍然佩戴着肩章、领章，背后扎着狍子皮做的坐垫。而我们作为指挥人员的军官呢，全都是黄呢料的军大衣，胸前有双排的铜扣子，只是不戴手套，也摘去了肩章。不管是官佐还是士兵，都戴着抗日救国军的臂章，这是我们唯一的不同于原来东北军的标志。

距敦化50多公里，有个地方名叫小沙滩，那里有个远近闻名的大地主，过去是王德林的拜把子兄弟，家里开着“烧锅”，名叫代风龄。代家将近百口人丁，都住在村当中，院落很大，四周有炮台，还养着一二百名炮手。全村的村民，都是代家的佃户。

在东北，只要是开“烧锅”的，总是一个积草囤粮的地方，我们部队路过这里，自然要“打尖”。代风龄呢，就命令手下人，杀猪宰羊，犒劳我们，确也现出一种似是豪爽的气概。这人60开外，留着胡子，胖敦敦的。实在说，我却没想到，他手下的炮手，有一些连珠炮、“大抬杠”、三八式，还有一部分竟是一色的20响捷克式匣枪。在当时，东北军这样的匣枪是少有的珍贵武器，自古军人爱的是骏马和宝剑，我也不例外，尤其是我们补充团，都是缴获来的老口步枪，牌子也杂，正需要这样的装备。

我就试探他的口气，问他，有这么些武装，你还打算抗日怎么的？是不是准备用来“自卫”的。不想，这个大地主代风龄，却是饱经风霜，善于察言观色的人物，他那双眼睛一闪，看来是心里震动了一下，因为抗日救国军缴获地主武装，在远近一带形

成风声鹤唳的威势，所以他不能不震动。他说：“那要看我盟弟的态度了。”态度故作磊落，却是暧昧的。我正考虑，用什么方式来缴他的武装，因为，这些武器在他手里是靠不住的，如果他不和敌伪妥协，就保持不久，如果他和日伪合作，那么未来又是我们的一个有力的敌手。却不料，他在为王德林布置的接风宴席上，竟当众宣布，他要追随救国军打敦化，他慷慨地说：“从今天起，我要在盟弟领导之下，参加抗日，跟着你们攻城！”救国军的将领当然都表示热烈欢迎，问他，那100口家眷怎么办？他说，已经安排好人，把他们都打发到关里去，看来，确有一种当机立断的坚决姿态，完全和水滸上的卢俊义的作风不同。

抗日救国的阵营里，增加了力量还不好么？结果，代风龄所率领的炮手队，又加上当地要求随之抗日的贫雇农，扩充为300人，编为一个独立营。代风龄任营长，带路打敦化。

2月17日，我们派了部分队伍，抢先把吉敦铁路几座险要的暗桥破坏掉，以断吉林的敌援。2月20日夜晩，我们的部队向敦化县城衔枚潜进的时候，有一个老年的农妇，在路旁喊叫，要求部队停止前进，我们的战士就禁止她大声喧叫，问她是干什么的！她说：“我儿子就是救国军。”我们的战士问她为什么开口骂人，以为她是奸细，有意捣乱来的。实际上，她是由于过度紧张，话没说清楚。她是说她的儿子在救国军里，因之，她知道，从敦化县已经开出伪警备队在前村打埋伏，所以赶紧来给我们部队送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抗日救国军和群众是有着一种怎样亲切的血缘关系。自然，我们绕开大路，又继续前进了。以后，才知道，她所说的警备队，就是原东北军第十三混成旅第七团的一、三两营，和王德林的“老三营”，在过去是同属一个系统的弟兄营。这天夜晩，全体官兵准备和我们会师，宣布起义的。他们的前哨已经听到我们在一二里之外的喊喝声了，因为有日寇的监督人员而未敢动。并因此又引起日寇的疑忌，以后，这个“警备团”就为日伪分割为若干小队了。从这也可以看出当时伪

军的思想动态，以及当时情况的错综复杂了，也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有缺点。当我们在镜泊湖第二次战斗，发现田野部队率领400挂零的残兵，逃出松乙沟，我们布置第三次关家小铺的截击战当中，就吸取了这次进军所得到的启示，主动的和伪警备团取得联系。

突然，部队在孤山子北方停止前进。我听到前头部队向后传来紧急的催唤声：“要参谋长到前头去！”我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大步赶到头前。原来，那个大地主出身的独立营长代风龄，向吴义成试探口风，企图打进敦化县去抢掠商店，呵！原来他的带头打敦化，是有他的坏主意的。吴义成当时说，这可要问问参谋长。我一赶到，就问吴义成和代风龄，我们部队离开小沙滩，不是一再宣布过三大军纪吗？在这里，我要补充说明，关于我们打敦化，到官银钱号去提商会募集的大批捐款和敌伪公款的计划，是秘密的，因为这关系到敌占区所有那些进行抗日募捐人员的生命安全。因之，我们只强调，打敦化是为了缴获敌伪武器，装备我们自己。我当时又一次说明，如果有人敢违背我们的三大军纪，就要按军法制裁。我开始认识到大地主代风龄阶级本质的卑劣性，因此，在敦化城郊布置战斗的时候，临时撤消了代风龄独立营攻城的任务，调为东郊的警卫，指定其警戒范围及职责，并宣布，所有独立营的警卫部队人员“禁止进城”。同时约定拂晓进攻，吴义成攻西门，补充团攻南门，北门派督战部队担任截击。王德林和孔宪荣，仍在50里外坐镇。

拂晓的进攻很顺手，补充团的部队由连副史忠恒同志率领，搭上云梯，首先越过城墙，在伪警察署打响之后，纵火围攻，敌伪伤亡将近400人，慌忙从北门溃退出去。枪支、弹药袋、军衣、军帽，丢弃满街，我们的部队，很快就占领了整个县城。警察署周围，有群众在救火，并向我们的部队欢呼，更有的扔下水桶赶来探询大局，我一一打招呼，不及宣慰。我在巡视各门我军防地之前，从街上先打了个电话到“永衡官银钱号”，找到我的先遣副

官，问他怎么样了？他在电话中说，万茂森会长还没有到，但“官银钱号”里已经动手点款啦！我答应随后就到。大街上虽说零乱，还有敌伪的遗弃尸体，但我们的部队秩序很好，有的肩挂3支步枪，正在打扫战场。在西门没找到吴义成，直到北门才看到柴世荣。

这人是在延吉二道沟当巡官的，怀着满腔热情，投奔到抗日救国军里来的。当时，在我们部队任督战指挥，正在城楼子上，瞭望日本军队溃退到西北山之后所建立的炮兵阵地，并且在敌人排炮发射中，还昂然地呼喊部队，意图在城楼上用沙袋筑防守工事。我在底下招呼他下来，他刚离开，那年久失修的城门楼子就被敌人的炮火所击中，轰然崩裂，所有砖、瓦、木头都四下飞落。他向我笑着说：“好险哪！你怎么知道城楼子要中炮？”我说：“我怎么会知道？我是要告诉你，我要到‘官银钱号’去提款，你要安排一下，马上带人到街上去巡逻，注意市面的秩序和军纪，尤其是火车站一带，妓女多，更要注意。”

交代之后，我就带着传令兵到“永衡”去了。在门口有些“官银钱号”的炮手们，热烈欢迎，他们本来是带着枪在门口探望街面上动静的。我们一进有铁栏杆排列卫护的柜台里面去，所有那些管事人都招呼我们进后院，到了他们的大厅里，只见有些早班职员，都围在会议桌上点票子。商会会长万茂森走过来向我祝贺，但脸上还带着为大炮声所引起的紧张神色，当时我们口干唇焦，但我们来不及找水喝，我们要求尽快的把款提走。但先遣副官说，已经点出三四千元的款来，万茂森和他周围的几个亲信的爱国士绅们说，所有的募捐名册都在这里，需要核对、盖章、签收，仿佛那么一些鬼手续得要3天才能办完似的。但尽管我们切断了吉林敌人增援的路线，也要尽快地把款子提到手。现在是分秒必争，时间珍贵，早一分钟，我们就多一份战果，迟一分钟，我们就少一份收获。我说，募捐人名册什么的，我们可以带回去查对，不要一份一份签收，你们只给个总数就好啦！于是，桌子拉

开啦，所有敌伪的公款，都一堆堆，一迭迭，从各库里搬出来，分头清点。总计约有30多万元。包括现大洋、日本金票、永衡官帖、哈洋等等。我一看，9点钟了，尽管他们的手法熟练，一两分钟就是百把元的票子过手啦，但这是几十万张的纸钞，和几万的现大洋呀！我就说：“不要这么一张一张点啦！你们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我们很感谢，现在你们就这样捆一捆装麻袋好啦！记一个大数就行，现大洋装一条麻袋，‘金票’装一条麻袋。”开始，他们很吃惊，仿佛这是钱财，哪能这么大手大脚地处理。但在万会长怂恿下，他们就开始按我所说的方法，一捆一捆地装麻袋，但仍然点着数，打着算盘记帐。总共近30万的现款，直到12点钟，才装上两卡车。这之间，又找麻袋，又找绳子，总之，车已经装好，单等开车的司机啦！商会万会长不知道什么时候，因为什么急匆匆给人招呼出去的，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所有“官银钱号”的炮手们都又手持匣枪跑上炮台去，我刚走出大厅，万会长就带着他周围的一伙士绅在院子里把我截住。我一看他的脸色，就知道有什么变故发生了。他大声说：“款，你们一个也不能提！现在你们部队在北大街抢了一家小钱庄，你们部队里有坏人，将来会告发的。这是人命关天的呀！我们的捐款簿子都得烧了，你们走吧！”又说：“赶快走吧！我们决不伤害你们，可是我们的炮手要打几枪，不打，日本军队开回来，我们没法交代。”原来，在北大街有戴救国军臂章的队伍，用大斧子劈开钱庄的铁页门，抢走4000元现款。我答应可以从捐款中提出4000元来赔偿，但被万茂森会长以及其围周的亲信所拒绝，他们说，不是4000元的问题，现在是有人会告发的问题。这不是我们对不起你们，是你们队伍里有坏人！你们赶快走吧！现在事隔20多年，我们也不想在这里苛责万会长，因为不久他终于和蛟河县税务局长于登云，商会会长萧庆功，敦化站电报员杨邦振，警务政巡官田沛森，吉林利群小学教员王樽，哈尔滨市电话局长徐箴，蛟河警务段长王涤中等13人被捕了，3月23日在吉林九龙口